

近代以来中国一度落后的地图视角

海图与海权关系紧密，近代航海强国均是海图测绘强国，海权的获取与国家的强大息息相关。

□ 撰稿 | 姜浩峰

郭亮是上海大学伟长学者、上大美院教授。这位长期关注于视觉艺术与科学的关系的学者，这次将视野投向了地图，在探寻明清以降，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度落后的原因时，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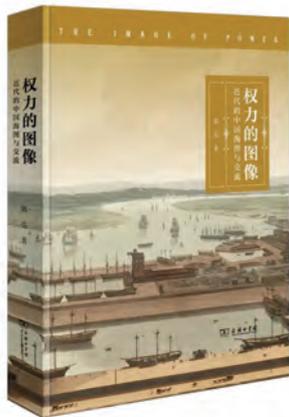
作者披露，在洋务运动之际，哪怕清廷召集大员，学习西洋工业之法，开机器、造枪炮，甚至编练海军，但仍然不重视海图。此前，则更甚！

“清代所建立的国家海防体系是一个海图与文本逐渐剥离的系统，清中后期时，无论皇帝还是大臣们几乎都习惯从文字中了解事态的发展，以至于海图到了后期越来越成为一种象征的图像。皇帝批阅奏折时，很可能看不到相关舆图，而地方的海（防）图只在一线指挥官手中。”

回看大航海时代序幕拉开之际，中国却突然退出——郑和下西洋等行动戛然而止。按照作者的说法，则是“1433年的大撤退”。而回看《郑和航海图》，与西洋海图有所不同。比如缺乏比例尺的概念，将波斯湾口小小的忽鲁谟斯岛夸大许多倍。作者认为，从艺术表现力上看，中国古代舆图早已有比较写实的自然景观和地质地貌呈现，这说明中国古代制图者并不缺乏制图技巧。也就是说，中国舆图与西方当时所绘制的地图有截然不同的呈现，根本原因在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

中西当然也有相同之点。

在当年的葡萄牙、西班牙来说，海图往往是机密文件。1504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推行“胡椒垄断”计划时，下令将所有航海资料保密。“要想得到一张航海图是不可能的，因为国王敕令，任何把航海图送往国外的人应处以极刑。”当年一名意大利特工人员在卡布拉尔由印度返回后曾如此抱怨。



《权力的图像：近代的中国海图与交流》
郭亮著
商务印书馆 2024年8月

而在中国来说，何尝不是如此？例如明代负责管理测绘的是钦天监和兵部职方司。钦天监要进行重大测绘事项，必须要经礼部上奏皇帝批准。当然，明代地图中，多数是大陆为主者。郭亮所著书中，展示了彩色的绘制于1389年的《大明混一图》和比利时制图师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绘制于1587年的《中国地图》。两相比较，即能看出，还是《大明混一图》看上去较为清晰且接近真实。“素以科学制图闻名的欧洲制图术为什么在这幅地图中失去水准？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欧洲制图师此时还未到达中国，他们的中国图形是来自各种描述而非实测！”郭亮如此写道。实际上，在奥特利乌斯绘图之前的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广东沿海就曾遭遇战事。时年56岁的广东海道副使汪鏐奉命驱逐佛郎机（葡萄牙）人。此时，葡萄牙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已占据屯门周边若干年。当时，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曾登上葡萄牙船收税，而获悉有多年在船上的中国人杨三等三人，已经“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于是何儒秘密派人与这三个人联络，“谕令向化，重加赏赉”，使得这三个人秘密乘小船上岸，并帮助明朝地方如法炮制葡萄牙式的铳，最终明朝对阿尔瓦雷斯“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在郭亮看来，当年葡萄牙舰队能够行至中国，肯定是在他们的海图指引下完成的。

写作此书，令郭亮总结出：海图与海权关系紧密，近代航海强国均是海图测绘强国，海权的获取与国家的强大息息相关。作者最后写道：“历史上，海权在全球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影响力。……海图即是世界。”

书讯

《暴走军国》

此书通过对档案文献的挖掘，结合实地寻访的所见所闻来呈现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二二六”政变、侵华战争及日本无条件投降等历史片段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以既有的学术成果为基础，辅以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进行解说，进而为读者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形成过程并探究当代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又是如何被形塑的。